

★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

章开沅 主编 ○

WENHUA CHUANBO ○

YU

JIAOHUI DAXUE

湖北教育出版社 ○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章开沅 主编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章开沅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ISBN7-5351-1927-1

I. 文… II. 章… III. 教会学校:高等学校-关系-文化-传播-中国 IV. G51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110 号

63-73
-77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5830435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本:850mm×1168mm 1/32

4 插页 13.75 印张

版次: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39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1927-1/G·1570

定价:21.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言

章开沅

就中国大陆而言,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至今已有将近 10 年的历史了。这 10 年工作进展的迅速与成绩的显著,已经得到许多中外学者的肯定。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的出版,就是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新的园地,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即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

从书名即可看出,我们不是仅仅就教会大学研究教会大学,也不仅仅是在教会史的范围来研究教会大学,而是从更广泛的文化史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特别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

无可讳言,教会和教会大学最初都是外来事物。正如多年从事中国教会大学的芳威廉博士所言:“早期由于(中国)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①这些学校的基督教性质更增添了浓厚的外来色彩,而基督教当时又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不同程度地连接在一起,因此中国民众的对抗情绪便难免要转移到教会大学身上来。其具体表现就是从 20 世纪初的非基督教运动,迅速发展成为政府主导和朝野结合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

从 20 年代后期开始,教会大学陆续向中国政府注册,标志着

^① William B.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P. Ⅱ.

教会大学决定性地走上本土化的道路,除人事、财务的逐步转变外,更为重要的是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同时许多教会大学都加强了中国文化的研究,特别是为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许多新兴学科在教学、科研、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所有这些变化,并非全都是由于民族主义的挑战和政府法令的压力,基督教内部的顺应潮流趋向与适应环境机制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如同任何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基督教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梦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包含着基督教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的普世性,是由各种各样文化语言的诠释、发挥逐渐构成的,20世纪中期以来的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早已不再专属于西方。仅就中国来说,基督教的传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然多经挫折与停顿;但即令是从19世纪中叶的重新加强传布算起,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并非全都是外国教会一味强行输入,其间也有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的顺应与调适,同时还有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认知与融合(尽管只有一定程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有不少外国传教士把中国“三自教会”(即“自治、自传、自养”,self-government, self-propaganda, self-support)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理念与目标。及至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为数众多的中国基督教徒和一部分领袖人物更为明确地强调并推动基督教本土化,因而也就更为加快了基督教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步伐。

经过基督教许多中外人士的长期努力,基督教在教会与神学两方面的本土化都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虽然国内外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特别是宗派林立的外国教会,对本土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各有不同,甚至迥然对立;但无论如何,对于如此长期存在、信徒

众多而且影响相当深远的基督教，再也不应笼统地称之为外来宗教了。稍为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早在抗战爆发以前，基督教已经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网络，包括教会、教堂、医院、各级学校、新闻出版、慈善机构、社工团体等等，其影响早已超越基督教社区，渗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连蒋介石夫妇提倡新生活运动，也需要寻求基督教青年、妇女团体的协助，其原因即在于此。

因此，我认为，我们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各自神学一样，都是世代流传而且不断发展丰富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历史唯物主义者自然要宣传无神论，反对有神论，更不会相信上帝创世说和救赎教义。但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又理应懂得宗教的产生与流传至今的原因（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与认知的），应该采取科学的、理解的乃至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宗教。只要不是为非作歹、触犯法律、危害社会的邪教，只要是遵守国家宪法与政策、法令的正当宗教，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全球性大宗教，我们就应该容许其存在，并且尊重和保护他们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包括宣传、研讨其教义的自由与必需条件。宗教问题甚至比民族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涉及到人类的认知领域。科学主义的偏失在于过分夸大了科学认知的能力，甚至对科学认知的局限视若无睹，而正是此种局限给宗教留下了并非狭窄的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宗教既然存在，它便成为构成社会诸因素之一元，便有其特殊的不可缺少的角色与功能。随着人们科学认知能力的发展，或是由于对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而沉溺于物欲，宗教的角色与功能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有所淡化，但是可以断言，在几个世纪乃至十几个世纪以内却绝不会消失。也正

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强宗教与宗教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借此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而且有助于宗教自身正常的、健康的、趋向高品位的发展,使宗教与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当然,学术研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政府的正确政策在这方面应该是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当前,物欲横流与精神文明的缺失,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发达国家的通病。即今是现代经济刚刚起步或起飞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老牌工业国家的沉痾痼疾也早已抢先光临,造成各种严重的社会隐患。因此,补救精神文明,特别是人文精神的重建,乃是当今各国有识之士普遍关注的紧迫问题。我想,宗教文化的研究对此也会多少有所裨益,而这也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动机之一。丛书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学术园地,我们热切地欢迎中外学者惠赐大作或批评指教。

1995 年盛夏于桂子山

目 录

序言.....	章开沅	(1)
---------	-----	-----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

——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	章开沅	(1)
----------------------------------	-----	-----

重新评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许苏民	(28)
---------------------------	-----	------

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的社会意义	董 黎	(53)
---------------------	-----	------

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

——华中大学个案分析	马 敏	(74)
------------------	-----	------

教育与宗教：一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	徐以骅	(111)
---------------------------	-----	-------

教会大学的产生与晚清社会的转型.....	余子侠	(147)
----------------------	-----	-------

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	王奇生	(175)
---------------------	-----	-------

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分子

——从燕京大学的几位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谈起

.....	史静寰 吴梓明	(209)
-------	---------	-------

辅仁国学与陈垣.....	何建明	(233)
--------------	-----	-------

论早期教会学校.....	曾钜生	(266)
--------------	-----	-------

让事实说话

——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章开沅	(281)
--------------------	-----	-------

论《水浒传》与《失乐园》中的魔道意识.....	邓晓芒	(305)
-------------------------	-----	-------

传教士与维新派.....	王立新	(331)
《万国公报》研究.....	刘家林	(358)
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乡村建设运动.....	夏 军	(381)
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	马 敏	(401)
论文作者简介.....		(429)

DA115/14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

——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

章开沅

中国教会大学在大陆已经绝迹 40 多年了,但它毕竟曾经存在半个世纪以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而且其影响至今仍然不难察觉,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①本文限于篇幅,只想就贝德士博士(Dr. Bates)所遗留的相关文献,并且循着贝德士的视角和思路,从宏观上考察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我自己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起步。

—

首先,应该介绍贝德士博士其人。

贝德士本名 Miner Searle Bates, 1897 年 5 月 28 日生于美国

① 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美国学者着手较早。从 1954 年开始,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主持编写出版一套有关教会大学的系列丛书,已出版有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 10 种。70 年代以后,又有一批学术专著出版,较重要者如 Jessie Lutz, "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1971; William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1976;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1976;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1980.

俄亥阿州的 Newark。父亲 Miner Lee Bates 是一位新教牧师，长期担任哈莱姆学院(Hiram College)院长，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小贝德士就在这所学院读书，于 1916 年(19 岁)获学士学位。由于品学俱优，得到罗兹(Rodes)奖学金，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历史。时值欧洲战火正烈，第二年(1917)他便离开牛津，作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干事随军前往近东，稍后又正式加入美国军队。

退伍后，贝德士回牛津继续读书，专攻近代史，1920 年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这年夏天回到美国，随即志愿接受教会派遣，前往中国南京在金陵大学任教。这是他在中国教学生涯的开始，直到 1950 年最终离华返美，前后整整 30 年。除金大以外，他还曾先后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大学等校兼课。同时，他又在课余兼职于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Christian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太平洋关系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等机构。他经常为报刊撰写国际评论，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

20 年代迅速蔓延的反基督教运动，特别是 1927 年的“南京事件”对金陵大学和贝德士本人都是一次猛烈冲击。金大副校长文怀恩(Williams, J. E., D. D.)惨遭杀害，外籍教职员全部撤退。贝德士偕妻携子，先到上海，继往日本。事态平息以后，他是最先获准返校的美籍教师。此后一直在金大教书，直至抗战爆发。其间曾一度赴美深造，1935 年在耶鲁完成《公元前 221—88 年的中国历史》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1936 年至 1941 年之前，他曾七次访问日本，作为教会代表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其政府政策。当时，他是较早也较清醒地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必将点燃全面侵华战火的警报的少数美国学者之一。

抗战爆发后，金大西迁成都。其时尚滞留于日本的贝德士，奉学校当局之命，历尽艰险穿过日军封锁返回南京，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产。南京沦陷前后，他是南京国际难民区委员会

(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的发起者之一,随后又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的骨干与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做了大量保护与救济中国难民的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贝德士又奉命交涉收回校产,为金大复校南京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7月29日,贝德士出席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目击者,他以无可辩驳的亲身见闻与实地调查资料,证实并指控日军大肆烧杀淫掳的万恶罪行。他的证词受到广泛传播和赞扬,他在南京沦陷期间援救难民的卓越贡献,亦曾经国民政府授予襟绶景星勋章以示奖励。

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和中美关系恶化,贝德士最终离开金大返回美国。此后一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担任教会史等课程的教授,并经常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关学术活动。1965年退休以后,开始从事《基督徒在华奋进六十年》(The Protestants'endeavours in Chinese society, 1890—1950)这一巨著的写作。迄至1978年秋猝然病逝,他穷尽13个寒暑,为我们留下约一千种书刊、报纸的摘录和复印资料,还有3800页工作笔记(working drafts),其中包括全书预拟提纲,许多章、节的提要 and 初稿等。这批宝贵资料,连同他生前细心保存的信件、日记、其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手稿等各种文献,共130盒,1000余卷,全部收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统称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贝德士文献是该馆“中国文献收藏”的一部分,编号为RG10,^①它不仅是贝德士一生的记录,也是中国

^① “中国文献收藏”原文是China Records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包括许多在华美国传教士的私人档案,内容极为丰富。

教会大学的一部实录。^①可惜至今学者还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二

为什么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Non-Christian Country)出现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建立的主要宗旨是什么?这个宗旨实现没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贝德士的手稿中寻求某些答案,虽然并不完整,也很难说是全面。

贝德士不仅是一个传教士教育家(missionary educator),而且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历史学者。他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去分析那些影响教会大学历史命运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因素。

贝德士陈述说,在1899年,在中国4.5亿总人口中,大约有2800个传教士导引着将近10万中国基督教徒。英、美传教士在一个贫穷的大国中工作,面临着排斥一切外来事物的强大挑战。传统的儒学教条和强烈的反帝情绪,成为基督教在华奋进的主要阻力。但是,古老的中国需要西方先进科技而又缺乏现代教育制度,却为传教士们提供了新的机遇。外国教会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学校在各种境况下接触中国人并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在1890年至1907年期间,教会学校迅速增多,其中包括几所学院和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

贝德士认为,教会大学是跨文化互动(cross cultural interaction)的产物。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1882年,只有一所教会学校可以界定为高等学校(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12年以后(1894年)增加到四所学院,不到300个学生。到1950年,

^① 以上贝德士简介,即据此文献所写,同时也参考了 Mands Taylor Sarvis, "Bates of Nanking", YMCA, 1942, pp. 1-7.

增加到 13 所大学,13000 个学生,这些教会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①

但是在基督教内部,对于教会大学却始终存在着意见分歧。贝德士指出:“教会中有些人强烈反对提升教会学校的层次,他们认为这将削弱‘直接福音’(direct evangelism)。宗教教育应是绝大多数教会学校的重要功能,只有口头布道和宗教仪式才能福音化中国(evangelizing China)。但是,罗伯特·斯皮尔,一位优秀的神学与福音传布者,他却深信教会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是一种优惠(advantage),这可以通过介绍新知识、基督教理念、道德规范,使之植根于人心,从而减少社会猜疑并改善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特别是对于那些徒有其表的基督徒。”^②

上述两种意见的争论,长期持续于基要派(Fundamentalism)与现代派(Modernism)之间。从历史上看,现代主义最初是指天主教内的一种运动,它宣告基督教义应随时俱进,容许作必要的调节适应,并与阿夫烈·路易丝(Alfred Loisy,1857—1940)及乔治·泰雷尔(George Tyrrell,1861—1909)的教旨结合。1907 年教宗庇佑十世曾严加谴责。此后现代派则是专指新教(基督教)中新的神学趋向,一般称之为自由主义或自由神学(Liberalism or Liberal theology)。现代派与基要派经常发生冲突,因为一方代表自由主义的新教教义(Liberal Protestantism),另一方代表保守的福音主义(Conservative Evangelicalism)。现代派潜心于对圣经作批判地研究,愿意接受现代科学某些与圣经教旨差异甚大的结论,普遍拒绝上帝自我天启(self-revelation)的观念。

① William B.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1976, pp. 14—15.

② Miner Searle Bates, “Gleanings—[redacted] Manuscripts of M. S. Bates” (edited by Cynthia Mclean), New York, 1984, p. 43.

基要派,特别是建立于美国的基要派,大约在1920年左右专指保守的福音主义。在1910~1915年间,有一系列小册书籍取名《基要》(Fundamentals),用意即在反对现代派,坚持传统基督基本教义与价值标准,特别是要排拒理性主义与现代派的腐蚀影响,维护源于对经典逐字逐句严谨研读的信仰。 (“the belief in the inerrancy and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贝德士面临现代派与基要派的冲突,并且明显地倾向于前者,虽然他并未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陈述。其历史背景大略如下:19世纪70年代,基督教革新运动即已开始,1890年至欧战期间更发展到高峰。革新分子们的成就之一便是海外布道运动。大学生志愿去海外传教的热潮,从北部、麻省很快遍及全美,到1914年已有约6000个学生作为布道者远赴异国。贝德士正是成千上万这一运动的跟进者之一。这个运动后来与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相连接,特别强调“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关心人们物质的和社会的进步,社会革新成为海外事工的合格验证(hallmark)。而在基要派眼光中,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就是现代派与进步主义,他们都难以认同。

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执很早已引入中国。邵玉铭说过:这里存在着自由派与正统派,或者是现代派与基要派的冲突。中国教会在1949年以前分成两个阵营。燕京神学院的领导人赵紫宸教授,一位中国宗教界很有思想的作家,由于他的有关中国哲学、传统、宗教思想和生活的论著而知名,而这些书都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位基督教领袖吴耀宗,由于《黑暗与光明》(Darkness and Light)一书而著名;燕京大学副校长吴雷川是清朝取得科举高位的学者,由于有关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而享有盛誉;两位吴先生不仅被看作是现代派,而且是宗教界的激进派。基要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宋尚节、王明道、倪柝声,他们大多是本地的传教士。他们的拘守基督教义的基要,对现代派深恶痛绝。中国基要派也反对“社会

福音”，人们只有通过圣经的个别中介才能获得天启。他们都是基督教的虔诚皈依者，但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并且忽视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发展。^①

贝德士与中国教会大学的多数传教士教育家们一样，都或多或少在思想上趋近现代派。他作为带有新观念的年轻教师来到金陵大学，经常与上述两位吴先生合作并热心参加诸如青年会之类的社会活动。在校务会议上，他的发言也体现了新的潮流，因而常能引起到会者的注意。因此，他以满怀同情的笔调叙述教会、教会大学和其他组织的社会服务：“与福音使者(messengers of gospel)的工作有明显区别，他们深受传教士应是中国社会重建(social regeneration)的因素这种看法的影响。许多划时代的革新，如反对鸦片与禁止缠足，都没有受到他们的鼓励。此外，传教士开办医院、麻风收容所、盲聋学校、孤儿院、戒烟所，为妓女、黄包车夫提供的服务等等。他们甚至试图组建男女童子军，尽管成就有限。无论如何，这些陈旧的弊端常常被革新所克服，因而赢得称赞。但各种问题根深蒂固，在许多领域阻力依然强大，传教士既缺财力也缺人力，因此只能做若干力所能及的事情。”^②

贝德士对社会服务的态度，反映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宗旨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的转变。1921 年伯尔登博士(Dr. E. D. Burton, 北美国外教会董事会主席，芝加哥大学著名教育家)率团考察中国教育。他们充分感觉到民族主义的强劲挑战和中国新式学校的迅速增长，并为中国的教会学校的革新提出三个口号。这就是：更讲实效，更加基督化和更加本土化(indigenous)。贝德士在手稿中摘录了伯尔登的报告书《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① Yuming Shaw,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20th Century", Taipei, 1980, pp. 6-7.

② "Gleanings", p. 44.

(“Report on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its present status and problems”),其中有一段话：“我们应当准备作必要调整，以求实现我们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的根本宗旨。……我愿留在中国，我愿留下来谋求为中国人提供最有效的服务，藉以体现基督精神。即令他们不让我形诸语言，可是他们无法杜绝我用生命来表达这一意愿的机会。我将通过基督徒的生命来经受考验，即令是不能以基督徒的语言来经受考验。”^①我们可以看到，十几年以后，贝德士在面对恐怖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明确地表述了与伯尔登相同的想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与其他人同样明白无误地知道，整个局势残酷黑暗到极点，在这里很难寻求正义。个人的问题早已得到解答。基督徒履行自己的职责，无须担心自己的生命，只是担心自己无力满足巨大的需求。”^②

什么是中国的巨大需求？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semi-colonial, 贝德士的工作笔记原文如此)国家，它为独立、国家统一和社会福利，奋斗了一百多年。因此，基督教的教会和学校必须深切关心中国的命运，努力服务，这样才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同。1927年2月，基督教中文杂志《真光》(“True Light”)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基督徒如何适应现代中国？》。作者徐天石的答案是：“基督徒能够适应当代中国的三个需要——民主精神的发展、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适度提升，增强物质文明进步。”8年以后，另外一位著名基督教作家谢扶雅，发表《当代中国基督徒的使命》一文，甚至宣称：“今日中国基督徒之使命是加速伟大的革命——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精神革命。”^③

当然并非大多数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同意去推动革命，但

① Bates' papers, B20, F309.

② “Bates of Nanking”, p. 5.

③ Shaw, *ibid.* pp. 480, 636.